

周政保 著

非虚构叙述形态

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非虚构”叙述形态

——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

周政保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周政保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9

ISBN 7-5033-1138-X

I. 非… II. 周… III. 当代文学-报告文学评论集-中国-文集 IV. I207.5-53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180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13.60元

目 录

自 序 报告文学的创作品性	(1)
第一编 一切从“非虚构”开始	(7)
“非虚构”的文学叙述	(7)
拒绝小说化描写	(10)
报告文学不是历史演义	(20)
重提“文责自负”	(23)
第二编 报告文学就是报告文学	(27)
创作的前沿精神与现实感	(27)
不可淡忘或漠视新闻性	(30)
讴歌的“设问”及立意	(34)

“非虚构”前提下的“文学性”	(38)
第三编 蓬勃的长势：收获与隐患	(43)
超常态的“繁荣”	(43)
报告文学领域的“伪劣症”	(54)
在卷入现实的“途中”	(57)
新的长进与新的忧虑	(62)
第四编 前沿话题：与作家的交流	(69)
写给报告文学作家的六封信	(69)
与李镜对话	(106)
与黄传会对话	(113)
与金辉对话	(122)
与徐剑对话	(136)
与江宛柳对话	(146)
第五编 由此及彼之一	(165)
人的精神的象征	(165)
磊落的宣战	(172)
讴歌与剖露	(176)
不是神话	(179)
作为窗口	(181)
华夏之光	(185)
底层的人格	(188)
仍然及时的译作	(191)

第六编 由此及彼之二	(195)
记录本色	(195)
警世的焦灼	(198)
面对历史的写作	(204)
刻骨铭心的精神怀念	(207)
“史”是一种契机	(210)
历史深处的“现实”	(215)
社会良知的出场	(217)
报告中国的一个侧面	(219)
强国不是梦	(222)

附 录

“非虚构”的写人艺术	(225)
谁是知识分子?	(245)

跋	(251)
----------------	-------

自序 报告文学的创作品性

在今天，报告文学已经成为最受大众欢迎的文体之一。当然，这里所说的报告文学，是指那些名副其实的真正体现了报告文学本色的非虚构创作——我想，任何领域都难以保证它的纯净性，报告文学也只能如此：所谓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恐怕是一种很真实的概括。

一是报告文学的重要社会作用，一是报告文学的当下状态及令人担忧的前景，两者综合，也就构成了我们所面对的创作现实——报告文学创作在面对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得面对自身的“现实”，而这一“现实”的严峻性，以及可能给报告文学的声誉造成的伤害，已经到了不能不引起警觉的时候了。

就我的文学观而言，我很看重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品格（其“个性”与“表情”），尤其是它与社会生活的直接关系。若论“干预生活”，无论是触及国计民生，揭露社会矛盾，还是抨击时弊或匡正世风，其他文学门类的可能性似乎都无法与报告文学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创作所传达的，是一个社会渴求进步的正义感或使命意识，正如我们从不少优秀作品中所感受到的，那是一种敢于向邪恶宣战的前沿品格，或一

种独立思考的既吻合潮流又体现公众利益的社会文化精神——倘若我们赋“知识分子”这一范畴以新的理解或含义，那便可以说：报告文学作家是最富知识分子特点的作家；他们往往站在时代变革的最前列，关注现实而对社会进步倾注饱满的热情，无论是批判还是讴歌——它们是一个值得公众尊敬的“作家部落”。

我们通常把报告文学称作“文学”，因而将文学的不少特性附加给这一文体，实际上，这样的理解已经渗入了相当严重的误会。在我看来，报告文学就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创作只是利用了或有限地接受了文学的某些方式或手段；它所可能实现的，也只是站在文学的边缘地带。很容易发现，真正的报告文学创作为了护卫自己的独立品性，对于“文学”不得不采取一种警惕的或“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文学创作中特别强调的某些至关重要的方式或因素，如虚拟、想象、夸张等，正是报告文学创作所忌讳与必须拒绝的……因此，在涉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时，我们常常会陷入尴尬的境地：既不能丢弃又不能无前提地强调。假如我们笼统地不加限制地把报告文学视作“文学”，那很可能导致一种现成思路所难以预料的重大错误（无论创作还是评论），而这种错误的结局，便是取消报告文学作为文体存在的合法性，或起码是因声誉的败坏而最终瓦解报告文学应有的社会功能——在今天的报告文学界，不少作品所呈现的诸多歪曲或误解报告文学创作的叙述因素，如与虚拟相关的“小说化描写”，与假定相关的“合理想象”，与典型化相关的“片面真实”，与夸张相关的各式各样的“粉饰”，等等，不能说与作家们将报

告文学简单地理解为“文学”无关。

不过，把这种叙述上的歪曲或误解，仅仅归咎于某些作家对报告文学的简单理解，似乎也不能算公正，因为就具体创作而言，其中确实存在一个出发点及驱动源的问题，或者说，因了报告文学是“文学”的缘故，即便是为某种不光彩的甚至很卑俗很下贱的目的，一些写作者也可以合理合法地打着强化“文学性”的旗号而变异报告文学的文体属性。在这里，也许用得着华勒斯坦式的思维方法，即面对一大堆难解的“问题”，决不是“再思考”（rethinking）所可能凑效的，而是要“否思”（unthinking）这些“问题”——当下报告文学叙述上所呈现的一系列“非报告文学化”的问题，不采取“否思”方法是不会有出路的。可以说，“再思考”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有可能使问题更加难以判断，甚至错上加错。譬如报告文学是否可以“合理想象”，或是否可以诉诸“适度的合理想象”。显然，这样的提问是一种圈套——因了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所以“想象”（无论“合理”或“不合理”）是绝不应该被允许的；既然不允许“想象”，那“是否可以”的提问便是一种荒谬。而“否思”的思维方法，就是要追问关于“问题”的提问方式，要在检讨前提的同时揭示那种毫无根据的先验假设，即首先不是回答（探讨）问题，而是审察与洞观问题的合法性，就如既然“是否可以‘合理想象’”的提问是一种无合法性可言的荒谬，那“再思考”的探讨便不可能产生意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尽管我们一直在对报告文学的所谓“文学性”进行“再思考”，但说到底，这样的“再思考”也极难截获有价值的结论，因为这里同样存在一个提问方式的合法性问

题。在这里，不只是对“文学性”的理解可能产生疑问，而且还得问一问报告文学究竟是不是“文学”——如果报告文学是“文学”，那“文学性”也就不可避免；倘若报告文学难以被称为“文学”，那“文学性”问题便可能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伪问题，因为刻意追求“文学性”的结局，完全有可能伤害报告文学的文体属性（特别是它的“非虚构性”），而“伤害”的后果，不仅会折损作品的新闻性及文献价值（或干脆使作品成为一堆文字垃圾），而且还可能把写作者送上法庭。这，大约也是报告文学创作与正宗的文学创作之间的重要分野。

我想说的是，我们大可不必把报告文学认定为“文学”——还是那句已经说过的话：报告文学就是报告文学。它既非“报告”也非“文学”。它是一种独立的拥有特别品性的文体（或叙述方式）——虽然它被称作“文学”或被纳入“文学”的领域，但这仅仅是一种约定俗成。我们所说的文学，通常是指诗、散文、小说与剧作一类的创作，但报告文学距离这些文学门类的审美特性，不仅显得遥远，而且是那样风马牛不相及。尤其是那些造就报告文学的基本特点，或那些前提性的支撑叙述的文体品性，如新闻性、文献性、非虚构性，以及为了这些特性的实现而必须诉诸的采访调查等，恰恰不是通常认定的文学创作所必需的。我以为，这样的理解非但不会妨碍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创作，也不可能影响文学手段的正常利用（即那种有限的或有前提的参与叙述），而且还可能促使创作更接近文体的属性与功能。

按通常的理解，凡富有时代的前沿精神，能深入审察人的生存状态及社会前景，做到卷入现实而思考现实，并将精辟独

到的见解贯穿于真实可靠的叙述之中，也就称得上是找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但这里所说的“灵魂”还不能等同于报告文学创作的独立品性，因为我们在诗、散文、小说、剧作之类的文学创作中，同样可以发现诸如此类的“灵魂”的存在，其间不同的仅仅是传达方式。不难感觉到，真正可以证明报告文学创作独立品性的，还不是“灵魂”，而是它的非虚构性，以及为保证非虚构性而绝不可或缺的采访环节——假如没有采访，没有非虚构性叙述的保证，那“灵魂”也就丧失了存放或贯穿的可能性。也许，造就的作品不无感人的“魅力”，但揭穿了只能是一个骗局。在我看来，什么是报告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特点，除关注现实、卷入现实、思考现实及有前提地利用文学手段之外，最应该提出的是：采访与基于采访的非虚构性叙述；或者说，只有坚持了细致审慎、严谨扎实的采访，坚持了叙述的非虚构性——是那种作品问世之后经得起挑战与考验的非虚构性，而绝非那种因刻意追求所谓的“文学性”而注入了水分或被打折扣的“伪真实”——一切关于报告文学的品性或特点才可能获得派生，如前沿精神、新闻性、“现实感”、文献价值等；否则，等待报告文学的只能是被消解的命运。

我在这里所强调的，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独立品性，而不是报告文学的文体特点，因为就作品来说，一般读者很难完整地鉴别其中的叙述是否坚持了非虚构性的原则——读者既没有参与采访，也不可能去核实，因而很容易被“栩栩如生”的描写所蒙骗。也因为如此，仅仅强调文体特点是表面化的或不彻底的。为了护卫报告文学的操守及最终的文体特点，从创作的角度强调报告文学的独立品性，具有前提性的现实意义——如今

的一些“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之所以不应该被纳入报告文学的领域，原因也在于这一类“创作”根本不存在采访对象，不是东拼西凑的“抄袭”，就是依据一点儿历史资料进行“合理想象”或演绎，最后的产品是不可能成为报告文学的——它们可能是历史随笔，可能是历史演义，因为其中的发挥与虚构成分，即便靠读者的常识或阅读体验，也是很容易感觉到的。但中国的报告文学界已经屡受欺骗，有的还获得了文学大奖。我想，现在到了应该把那些所谓的“历史题材”逐出报告文学领域的时候了！当然这不是说，凡“历史题材”都不可能成为报告文学，关键的问题在于有无采访对象。若有，不仅可能创作出优秀的报告文学，而且因了采访所具有的某种“抢救”特色，或许可以成为更具文献价值、甚至因“首次披露”而更具新闻性的历史题材作品。这，便是我说的“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限度。

1999年1月 北京

第一编

一切从“非虚构”开始

“非虚构”的文学叙述

其实，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非虚构”问题，我已在以前的一些文章中谈论过。如今之所以要重弹老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下的报告文学仍然摆脱不了虚构陋习的困扰与侵害，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承认“适当的合理想象”，以及所谓的“必要性”。不难发现，在相当数量的（包括某些获了大奖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大至历史人物的行为言谈，小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内容，叙述中的引申与编造，确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可以说，即便不作严格的调查核实，仅凭直觉或从是否合乎情理的角度审察，也很容易挑出“失真”的毛病。倘若这样发展下去，报告文学在文坛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煞不住的虚构之风，哪怕是局部的“失真”，都

将波及到报告文学的社会信誉和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任何作品都得仰仗读者的检验，而一切低估读者判断力或企图糊弄公众阅读的做法，无疑是愚蠢的。更何况，一部有价值的报告文学作品，其最终的可能性还得穿越漫漫的历史通道——倘若你否认自己的作品是文学垃圾的话。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历史只承认报告文学应有的品质。

何为“报告文学”？我们已经给它归纳了不少“特征”，诸如真实性、新闻性、文献性或社会批判性之类。但回过头来细细琢磨，其中的似是而非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倒可以构成这些“特征”的“特征”。不难推断，报告文学之所以可能得到文学家族的承认，并成为其中的重要分支，原因便在于这一文体的叙述拥有相应的文学性（或文学特质）。但就一般的文学性而言，体现文学性的叙述大都离不开、而且必须强调基于虚构的想象力，如小说、诗或某些散文等；特别是在文学创造性或艺术成就的衡估中，想象力的开拓往往成为一种必须尊重的标志。这样一来，既是“报告”又是“文学”的报告文学创作，也就陷入了两难的处境。怎么办？或怎样才算是报告文学？或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学性？这就涉及到了报告文学的最基本的特性——不是别的，就是它的“非虚构”。作为这一文体的原则或前提，不管是何种题材（是历史还是现实），也不管是怎样的“报告对象”（是人物还是事件或者是社会现象），只要所选择的文体是报告文学，你就得将“非虚构”视为自己的身价性命。也就是说，无论是何种形态或方式的“文学性”，都必须以“非虚构”为前提。这是一种自由中的不自由。否则，报告文学的价值就可能受到折损，甚

至被彻底摧毁，而“文学”的意义也将丧失殆尽。

实际上，在“非虚构”的前提下，报告文学的“文学”仍然拥有广阔的发挥余地。这是一种不自由中的自由。如创作过程中的叙述所可能的思情张力、寓意的超越性、含而不露或以外寓内的表达方式、细节场面的合传达目的性的选择及运用、乃至不动声色的象征手法的贯穿，等等，都可以成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的具体而独到的体现。我们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即“非虚构”的叙述特征，绝不可能减弱或黯淡报告文学中的“文学性”。我很相信斯蒂芬·茨威格的判断——他说：“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需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序言》）。茨威格说的虽是传记文学的创作，但他的观点对于我们国度的报告文学创作，也同样具有启迪意义。因此可以说，报告文学所可能的生动与深刻，在很大程度上是执守“非虚构”的一种叙述效果。

“非虚构”的报告文学特征，在很多场合被概括为“真实性”（或所谓“严格意义上的真实性”）。我之所以不想使用“真实性”的概念，主要是因为这一概念过于宽泛与含混——作为文艺（还不仅仅是文学）理论领域的常用概念，所谓“真实性”，无论是“生活真实”还是“艺术真实”，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感受或主观判断，其中的模糊及那种摇摇晃晃的不确定性，是极容易感觉到的，以致人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景，即面对同一部小说，不同的读者在是否真实的判断或感受上，

竟可能达到大相径庭的地步。而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则是一种特指的限定，即叙述必须符合传达对象事实的那种“真实性”，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非虚构”——与其使用“真实性”，还不如以“非虚构”来限定报告文学的叙述，其优越性在于：一是更加明确，不致于产生歧义；二是在理论阐述上免去了可能与一般的文学“真实性”混为一谈的麻烦——至少可以说明，报告文学的真实或不真实，决不是一种充满了主观色彩的判断或感受，而是或必须是一种非虚构的、也不允许虚构、不允许“合理想象”与随意发挥的叙述，一种必须与对象的过程（包括细节场面或人的言谈举止等）相符合的实事求是的叙述。

我想，再找不到一个概念，比“非虚构”更能概括报告文学创作的特征或品性的了。

拒绝小说化描写

这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为了尽可能说清楚，先摘录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中一段描写：

想到此，周恩来急忙回到办公桌前，伸手按住了直通毛泽东的红色电话。可他刚一拿起，又放了回去。

他犹豫地看了一下表，时针已指向午夜一点。他顺手拿起一支红蓝铅笔，轻轻敲打着自己的额头……

此刻的毛泽东在想些什么呢？周恩来手中的铅笔在额头上突然停住了。他清楚地记得，苏联卫星上天那个夜晚，毛泽东激动难抑，刚刚看完电文稿，便匆匆给他打来电话，希望他尽快组织有关专家论证一下中国的卫星问题。现在，美国的卫星又上了天，毛泽东一定是又在坐卧不安了。

片刻，周恩来眉峰一抖，还是伸手拿起了电话。

话筒里传来的不是毛泽东的说话声，而是“嗤嗤”作响的吸烟声。

周恩来略为一愣，还是故作轻松地开了口：

“主席，航天女神敲门来了！”

在如今的报告文学创作中，类似的描写虽不能说是比比皆是，但说相当普遍则是应该承认的事实——这是比较典型的“小说化”写法，其中的描写很生动、很具体、很传神，也颇能体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人物心境。但从特定意义上说，这样的描写只能是想象力的结果。或者说，它与报告文学应该遵循的有根有据的“非虚构”原则，实在是相去甚远（笔者注意到，这部作品在另一家出版社出版时，删去了“‘嗤嗤’作响的吸烟声”、“略为一愣”及“故作轻松”的描写）。当然，对于这样的“小说化”描写的“真伪”，读者是无法鉴别或不可能获得相应的证明材料的，因为读者“不在场”，也不可能去进行采访调查，何况，“当事人”早已远去，而当时又没有第三者“在场”。但读者有权提出质疑：描写的依据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可能有什么绝招，惟一的办法就是“合理想象”，或